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五〇〇）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六八期 ——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9b）

| | | |
|--------|---------------------------------|-----|
| 【百家争鸣】 | 陈伯达之命运 | 钱伯城 |
| 【人物春秋】 | 大将许光达的“文革”岁月 | 李意根 |
| 【研究动态】 | 重写周恩来，撼倒“不倒翁” | 寒 山 |
| 【书 评】 | 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宜细不宜粗 ——评舒云《林彪画传》 | 仲 岩 |
| 【自由论坛】 | 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 陈永苗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百家争鸣】

陈伯达之命运

• 钱伯城 •

◇ 从《中国之命运》说起

本文题目，仿自《中国之命运》。1943年3月，蒋介石用小册子形式出版了一本大著作《中国之命运》，借国家名义，鼓吹国民党一党专政，实际是鼓吹“蒋介石之命运”。此书于7月间传到延安，毛泽东对几个“秀才”说：“看来，蒋介石给你们出了题目了。”陈伯达领会毛的意思，立即动手写反驳文章，用三天三夜，心情激动，笔泪俱下，也写成一本小册子大著作《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阅后，亲为改定，交《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刊载，并传往国统区，广为散发。又译成外文，向国外宣传。同时国统区和解放区都作为党内学习材料，组织讨论。

陈伯达晚年回忆道：

《评〈中国之命运〉》是我的一本主要著作，这本书不仅当时在延安和解放区广为印发，而

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产生了影响，并被印成英文，传到英美等国。美国共产党领导人白劳德和一些西方评论家曾对这本书写过评论文章。这本书对于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起了作用。李六如（引者注：时任中央军委办公室秘书长）当时对我说：“你的一本书顶了几个师的力量，如《孙子兵法》所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71页）

其实，这本书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甚至超过了批蒋作用，陈伯达晚年可能出于谦退的原因不提，这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几乎与王稼祥为纪念党的二十二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率先提出“毛泽东的思想”这一概念的同时（这是经过1942年延安整风达成的全党共识），陈伯达进一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这个提法：“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是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个思想上，不但和苏联共产党的思想相同，而且也 and 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思想相同，但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是要求每个国家的共产党人根据自己的国情提出政纲，决定政策，而依靠人民自己救自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工作中正是这样做的。”（此据叶永烈《陈伯达其人》129—130页转引）比起1945年刘少奇在中共七大全体会议作关于党章报告，正式启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定之为“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还早了两年。陈伯达的表述敲响了“毛泽东思想”新时代来临的更为宏亮的钟声。这也说明他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善于发现并领先掌握理论制高点。

按七大的几个主旨报告，各有起草者、修改者和审阅者，报告人最后审定。现在知道毛泽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先起草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是由陈伯达起草的。朱德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是由陈毅起草，陈伯达修改，陆定一审阅（以上均见《陈伯达最后回忆》，73页）。唯独刘少奇的党章报告，缺起草人和修改人名字，但可肯定刘不是起草者。陈伯达曾参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的整理，书中引用孟子“天之降大任”一段，即陈所加。而党章报告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与陈伯达先此所论亦大同小异，故不排除陈曾参与七大党章报告的起草或修改工作。据陈伯达自述：“那个时候，我们党的风气比较好。像起草文件这样的事，具体的过程并没有让大家知道。因为这是讲究党的工作，要经过会议讨论，所以没有记到哪个人头上。”（同见上书）

以《评〈中国之命运〉》为起点，陈伯达认准和跟准毛泽东，开始了忠于毛、顺于毛，至死不渝的一生。同时，以此为起点，也奠定了作为中共“理论家”的地位，成为毛泽东“秀才”班子中的首席“大秀才”，毛倚之如左右手。1970年8月31日，在风云突变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突然写下那篇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宣布陈伯达为“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政治骗子，但仍承认，“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语含讥讽，尽露不屑之情，但文中连见两次“天才理论家”这个称号，即使是贬词，也不会是凭空说出来的。毛泽东一手导演了陈伯达从“天才理论家”到“政治骗子”的悲剧——陈伯达之命运。

◇ 值得认真研究的人

最近看一篇文章，引述一位甚有名望的老学者对朋友说的话：“中共党史有四个人值得认真研究：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和胡乔木。”老学者本人就是中共党史中人，见多识广感深，这番话自然有见地，有分量。但朋友间也产生一个问题：胡乔木何以能忝列其中呢？好像此人在“值不值得”上还差一点。我倒觉得“忝列”得有道理，他是笔杆子中的主要一杆子。共产党靠两杆子打天下，许多时候，笔杆子比枪杆子走在前头，作用也大。李六如说《评〈中国之命运〉》，“一本书顶了几个师”，“不战而屈人之兵”，即是一例。过去大家有一误解，总以为领袖个个出“选集”，必是大理理论家，殊不知大都是笔杆子起草或“整理”出来的。但只列一个胡乔木不够，该加上陈伯达。这两人不能说孰重孰轻，都重，都不轻，有同有不同，但“毛泽东思

想”的构筑，二人缺一不可。两人加在一起，笔杆子的作用方见突出。有意见或许认为，已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反革命罪服刑的陈伯达，业已“盖棺论定”，不值得再论了。我说不然。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第21节提到“中央文革小组”，只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名，不提组长陈伯达；同节提到“九大”加强了林、江、康在中央的地位，也不点位居中央常委第四的陈伯达名。据陈晓农记载，“决议通过不久，中央派人探望了被关押的陈伯达，向他说明中央认为他与决议点了名的那几个人是有区别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348页）。1982年4月23日，陈伯达得到北京公安局批准，看望早获平反、解放的周扬。后者与他谈起历史问题决议的事，说：“这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有几位同志为你讲了话，我也讲了几句，但主要是那几位同志讲的。现在采取了区别，对你有些优待。”（同上书，432页）但周扬没有说为陈讲话的同志的名字。又陈伯达自己对陈晓农说：“没有点我的名，有很多理由。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现在重新肯定了党的八大。八大文件主要是我起草的。首先提出发展生产力是主要任务的也是我。”（同上书，131页）。由此可见，陈伯达“盖棺”尚未“论定”。

陈伯达的“理论家”身份，在“文革”前期（1966—1970）阶段，亦即出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至“九大”当选中央五大常委之一期间，达到了顶点。造反派组织见他当上了中央常委，立刻在“理论家”后面又“好上加好”，送他一顶“政治家”桂冠。但这顶桂冠，始终未见之于官方宣传。只在陈倒台后的“批陈整风”尚未公开点名期间，曾被冠以“大大野心家”的帽子，含一点“政治家”味道在内，但只是作为陈伯达自称“小小老百姓”的反面意味了。

这里摘录一份1969年4月“九大”开过之后不久，关于陈伯达同时加上“理论家”与“政治家”两项称号的颂美之词，载于同年8月由署名“红代会某某大学委员会编印”的全公开、半官方式《读报手册》上面。这本《手册》有70万字，标明“内部参考”（事实上是公开发行），版权页上印数高达20万册，是传达“九大”最新指示和精神，覆盖面广，代表性强的舆论导向读物。陈伯达的名字，列于《手册》开卷第一部分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万岁”栏目内，“司令部”共六人，毛、林、周后就是陈伯达，陈后面方是康生、江青。其中关于陈伯达的介绍，先引一段比陈地位还要高的某一位领导人的讲话。讲话说：

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林彪同志领导下，我们党最好的理论家。在林彪同志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提倡下，陈伯达同志最善于发挥、善于阐明毛泽东思想。

这代表“九大”这个“司令部”的集体评价，尚限于“最好的理论家”这个层面。《手册》关于陈的正式介绍，长达5千字，则从这个层面往上大抬特抬。现摘录第一段：

陈伯达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毛主席、林副主席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杰出的政治家、理论家。从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陈伯达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始终紧跟毛主席，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的胜利建立了巨大的功勋。

这代表的是革命造反派组织自以为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对陈伯达的评价，表述了革命群众对他的崇高景仰之情，超出了中央“司令部”认可的范围，却反而是帮了倒忙。让人们看到，这份偶而留存下来的“文革”材料，所记载的对陈伯达两种层面的颂扬之词，既透露了他事业的顶点，也透露了将从顶点滑落的预兆。这种中央“司令部”内部的微妙关系，革命群众是蒙在鼓里的。

毛泽东对陈伯达信任以至重用，主要是看重他的“书生”本色与“理论”头脑。陈伯达对毛有知遇之恩，报答也就在于出点子、出思路和出“理论”。陈伯达追随毛泽东，为其所用，有

他特具的特点：第一、学识渊博，古今中外，融会贯通。第二、思路敏捷，下笔千言，常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化腐朽为神奇。第三、一左到底，能按不同的气候、时机，提出观点、口号。有的看似学术问题，实为政治所用，最终成为党的方针、政策。“文革”初期，上海某大学有一个声势很大的战斗队叫“反到底”，陈伯达可叫“左到底”。第四、谨慎小心，唯毛是从；却不谙世务，包括探摸毛的读书爱好，手法笨拙可笑，是个“书呆子”（江青语）；而性格懦弱，可随意使唤呵斥，仍忠诚不二。但毛所允许他所拥有的头衔，最高只能像那本《读报手册》引载中央某领导人说的，“最善于发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最好的理论家”。超越这条底线，就超越了毛所允许的范围。

陈晓农曾问父亲，在和毛主席谈话中，是否谈过打仗方面的事。陈伯达笑了笑说（“笑了笑”是陈晓农的原文）：

谈是谈过，只是谈的次数很少。我于1936年出的那本军事文集《国防概论》，主张抗日战争应以游击战为主，估计毛主席也看过。我曾两次在军队中工作过，一次是北伐战争，一次在抗日同盟军。在苏联也学过正规的军事课程，对于军事并非一无所知。抗战前夕，我在北平曾注意研究过抗日战争一旦开始，以后战略方面的问题，在《华北烽火》、《长城》、《国防》等刊物上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毛主席认为我是一个书生，没有实际的打仗经验，所以不愿意和我多谈这方面的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66页）

这一段看似寻常的延安时期往事回忆，陈伯达叙说前“笑了笑”，想是带有一点自负的意思：军事方面我也不是不懂呀。可惜却忽略了最重要的毛泽东当年的表态，认为他“是一个书生”，不愿意和他“多谈这方面（指军事）的事”。要知道军事和军队，是毛泽东亲自掌控的敏感领域，岂容外人置喙或插手？而作为“书生”的本职，基本上是隐于台后作业，忽然跳向前台，去某一军区指手划脚，作中央领导人“重要讲话”。在毛眼里，若不是得意忘形，也是忘乎所以了。毛的禁忌，陈伯达早年尚知自饬，日久顽生，便不以为意，庐山最后失足，其根在此。而看上面回忆，又似老来犹未悟及此理，此即是所谓“悲剧”了。

据这段回忆谈话的解读，我想可以解开1970年8—9月庐山会议上的一个疑团：毛泽东为什么独挑陈伯达作为开展新一轮接班人斗争的祭旗牺牲？其中的关键，就是陈伯达不自量力地插手了华北地区两支驻军的派系之争（按此属北京军区），又频繁接触当地官员，关系密切，行踪可疑。关于这次陈伯达表态处理华北驻军派系之争事件，“文革史”著作，有称之为“冀东大冤案”，有称之为“华北会议”或“华北问题”。1980年11月25日特别法庭对陈伯达的判决，罪名之一即“冀东冤案”，适用《刑法》“诬告陷害罪”定罪。陈伯达对儿子说：“审判时，这个案子最冤枉了。”（《口述回忆》，332页）陈伯达喊冤是有缘由的，因为“文革”期间（1967—1970年）他的三次华北之行，都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集体讨论，并报请毛泽东批准的。行前有请示，归后有汇报。陈晓农亲自看到过父亲的这些信稿。他在《晚年自述》（340页）写道：“陈伯达在华北之行前后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的请示信和汇报信，陈伯达的秘书也都看到过。这些材料理应都有存档文件。”但是，陈伯达却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他的华北之行虽是中央的分工决定，任务只是解决省市革命委员会和协调地区工业生产方面一些问题，并没有叫他插手驻军派性武斗或表态支持某一派问题（所谓冀东血案即其一）。这直接触发了毛泽东的不安和疑忌，决定就在庐山这次会上把他“拿下来”。

毛泽东在庐山宣布打倒陈伯达，真实意思先藏起来，让这批中央委员如坠庐山云雾，看不清真面目。但在私下，为了安抚林彪及其亲信少安毋躁，分而治之，又把真话告知，表示信任。吴法宪是这次庐山鼓噪设国家主席最起劲的人，生前写了一本回忆录，亲身经历这场戏剧性的倒陈批陈一幕。他回忆道：

1970年8月31日下午三时，林彪在他的住处召集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和汪东兴开会。他对我们说：“下午到了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指示，陈伯达在全党、全国的威信太高了，这次庐山会议要把他拿下来，要我和你们先打个招呼，和陈伯达划清界限。毛主席说，要我先找你们开一个会议批判、揭露陈伯达。”（《吴法宪回忆录》，812页）

在另一处，吴法宪又发表议论道：“在这次庐山会议上，林彪一番讲话（指开幕式上林彪赞颂毛泽东‘天才’的发言），整个全会一哄而起，连毛泽东都说这是‘有党以来从来没有过。’毛主席几次说：‘陈伯达的威信太高了，要把他拿下来。’现在想起来，不是陈伯达而是林彪的威信太高了。”（同上书，823页）说的是“全党、全国的威信”，实质是指“在全军的威信太高了”。

按吴法宪在陈伯达与林彪关系、林立果工作安排等问题上，曾有说假话、提伪供的前科（《最后口述回忆》，419页），声誉不佳；但《回忆录》是他刑满释放，晚年家居，改名“吴澄清”后的作品，以示“看淡一生的荣辱和功名”（见《回忆录·附录》吴新潮文），大概也有“澄清”史实的意思，不必要再说假话、作假供了，所述应属可信。因为把陈伯达“拿下来”，决不是到了庐山，临时做出的决定，更不是张春桥、姚文元哭诉的结果；而是导师蓄之已久，观之已久的一个战略部署。即使没有“天才”和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陈伯达也可有别的什么问题“拿下来”。

再说陈伯达究竟有多高的“威信”呢？连吴法宪也认为，“其实陈伯达的威信一点都不高。在中央文革里，他就像一个受气的‘小媳妇’，康生、江青都是随便骂他、讽刺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后来才逐渐向林彪和我们靠拢”（同上书，812页）。按江青和康生的态度，实为主子对家奴的态度，但他们不过是二主子或三主子，他们的擅作威福来自大主子。但是毛泽东对陈伯达的疑虑，也不是没有来由。那就是陈伯达的三次华北之行，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党政军特别是军界积累了不少人气，许多人倚仗他来解决问题，在毛看来，形成了一个以陈伯达为首，李雪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为文武大将的所谓“华北山头主义”（江青语，当然来自毛的判断）。加上又出现陈伯达有靠拢林彪接班人的动向，家奴二心，最易引起主人加倍的愤恨，加倍的惩罚，必欲除之而快了。

毛泽东的这些想法，在庐山没有讲出来（也许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康生是知道的），但在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用批示和谈话方式，陆续传布出来，更多的人方才得知一些真相。比如《陈伯达口述回忆》（335页及405页）中载有毛泽东于10月14日对吴法宪检查的亲笔批示，说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叶群在10月13日的检查中也说：“对于陈伯达问题的认识，过去出于主席在会上打过招呼，江青同志也几次同我们打过招呼，对陈伯达错误言行是有所察觉的。”又11月16日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也指出：“陈伯达历史复杂，是一个可疑分子。”这都证明毛之决定打倒陈伯达，蓄谋已久，江青等人早就知道，1969年5月17日江青独自召集黄永胜、吴法宪等六个政治局委员开会，向他们透露陈伯达历史上有问题，曾经被捕，有托派嫌疑（《吴法宪回忆录》，754页）。连叶群也说听毛和江青打过“招呼”，而陈伯达本人，则一无所知。

1970年12月16日，离庐山会议闭幕三个月，毛泽东在北京军区三十八军一个检举揭发陈伯达的报告上批道：“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谈，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转引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47页）1971年3月24日，毛泽东在黄永胜等人检讨上有批示：“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1931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

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转引同上书，349—350页）这就把打倒陈伯达的原由，主要在于一个“军”字，清楚告诉大家了。

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揭发陈伯达罪行，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文件，大都重复毛泽东批示、讲话，几本《文革史》著作多有摘引，不再缕举。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庐山上毛泽东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反对称他为“天才”，反对拥戴他出任国家主席，是不是表面文章，仅为打倒陈伯达，震动林彪，找一个借口呢？

我看，回答这个问题，可说是，也可说不是。

说是，人总爱听好话、称赞话，虽伟人不免。否则的话，从唱“东方红”（只有一个彭德怀不爱听），喊“万岁”，到跳“忠字舞”，数十年来如一日，从来未见反对，现在忽然反对称“天才”、当国家主席，如果不是“伟大的谦虚”，理上说不过去。林彪、陈伯达想不通，两百多个中央委员（连汪东兴、王洪文在内）除张春桥、姚文元、康生、江青之外都想不通。

说不是，因为这次的反对称“天才”、当国家主席，的确是毛泽东的真实想法。这又是什么道理呢？近来人们常用一个心理学的术语“审美疲劳症”，来解释人的视觉和听觉的厌倦感的产生；就是说，即使是艺术上的精品，看得多了，听得多了，也会有一种厌烦或困倦的情绪或感觉发生出来。伟人也不例外。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接见写过《西行漫记》的老朋友斯诺，说出心里话：“什么‘四个伟大’，讨厌！”斯诺说：“我不知道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转引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49页）“讨厌”二字，生动地说明毛泽东也存在“审美疲劳症”的心理，庐山上反对大家赞“天才”，设国家主席，不是做表面文章。

林彪、陈伯达这些人，不理解毛泽东的真实心理，错会了他的意思，所谓“马屁拍到了马脚上”，正像陈伯达对陈晓农所说：“在他（指毛）那里工作，我还是很小心的。在庐山说他是天才，那也说好话嘛，紧说好话也不行？”（《最后口述回忆》，412页）好话说多了，更会引起怀疑。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把他们放进他对斯诺说的假喊“万岁”的第三种那类人里面去了。1971年8—9月期间，毛泽东外巡讲话，提到这次庐山会议，说道“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三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转引叶永烈《陈伯达传》，536页）这是事过一年的讲话，有一年时间的思索，所以每次发起政治运动针对敌对分子的惯用词，如“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等等，全都用上了，“天才”和设国家主席也成了反党纲领；但在庐山当时，对陈伯达的批判，还没有这么明确具体。我想，陈伯达倘若看到这篇讲话，可能会感到眼熟。他为毛泽东起草搞什么运动的文稿时，也可能常用这些专用词语来形容将被打倒的对象。

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中央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1971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根据专案组审查结果，给他戴上“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五顶帽子。1981年1月25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主犯之一，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陈伯达是特别法庭上不为自己罪行辩护的三个主犯之一。另外两个，一是张春桥，不承认自己有罪，自开审到宣判，保持沉默，不发一言。另一是王洪文，公诉人说他“认罪悔改，愿意承担罪责”。

据陈伯达传记作者叶永烈记载：1981年8月，陈伯达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17日，中央公安部一副部长来到病房，宣布他服刑期满。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在北京寓所去世。终年85岁。

陈伯达晚年，严于自责。1988年10月底左右，叶永烈在公安部为陈伯达举行刑满仪式十来天后，就对他进行了采访（叶永烈《出没风波里》，358页）。在与采访记者第一次谈话时，陈伯达就不胜感慨地说了下面一席话：

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愚蠢至极，负罪很多，枪毙我都不过分。“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候我是一个发疯的人。

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年已久远，我又衰老，老年人的记忆不好，而且又常常容易自己护短。如果说我的回忆能为大家提供一些史料，我就慢慢谈一些。不过，我要再三说明，人的记忆往往不可靠。你要把我的回忆跟别人的回忆加以核对，特别是要跟当时的记录、文章、档案核对。我的回忆如有欠实之处，请以当时的文字记载为准。

我是一个罪人。我的回忆，只是一个罪人的回忆。

古人云：“能补过者，君子也。”但我不过是一个不足齿数（一作挂齿）的小小的“小人”之辈，我仍愿意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弥补我的罪过……

这份充满“臣罪当诛，天王圣明”，自责自谴情绪的文字，哀哀其鸣，先后载于1990年出版的《陈伯达其人》和1993年出版的《陈伯达传》卷首，是叶永烈根据采访录音和记录文字整理而成，虽然个别文字可能有所修改，但可信是陈伯达真实思想的表达，是他留给后人的一份“政治遗言”。

◇ 一个群体的悲剧

陈伯达在他的最后遗言中，说自己一生是一个悲剧，自己是一个悲剧人物。若从个人来看，从他所处的时代、社会和政治体制来看，这样认识自然不错；但是，若从历史角度来看，则是一个群体的悲剧，他是这个群体有代表性的一个精英人物。这个群体，可称之为儒生群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为不同政治体制的中央领导人做秘书的“秀才”群体。

儒生是儒家的信徒，服务对象是最高统治者的君王，他们的工作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汉书·艺文志》）。儒生爱讲话，发议论，经常争论不休。他们的命运，主要系于人君的喜怒仁暴。秦始皇认为只有科技管用，讨厌儒生高谈阔论，一发脾气，把四百多个儒生坑掉了，书也烧光。这就是遇上暴君了。汉朝的贾谊，是儒生中的“大秀才”，与汉文帝谈得来，为文帝出了不少治国好主意，有的虽然疏阔无用，可一笑置之。著名的“夜半前席”故事，讲君臣相得，秉烛夜谈，文帝虚心请教，听得起劲，不觉越靠越近了。这就是遇上仁君了。汉武帝不仁不暴，亦仁亦暴，是一雄猜之主，司马迁是他的“大秀才”之一。为李陵投降匈奴说了几句武帝不爱听的话，便以扰乱军心罪，处之腐刑。司马迁以自身遭遇，为儒生群体的地位做了一个定义，在有名的《报任少卿书》中写道：

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

就是说，凡属这个群体中人，地位是很低贱的，照司马迁所说，这个群体分为四家：文史一家，星历、卜祝、倡优为另三家。但后三家，经过两千年的演变，已进化为天文学家、数学

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表演艺术家等等，只有文史家，没有多少长进。后代以来，有不只两个朝代，“倡优所畜”不如改为“家奴所畜”，更切实际。令人惊叹称奇的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江山代有才人出，而现当代一些“秀才”，地位仍未提高那里去，仍然沿着他们前辈的轨迹行进。“好学生”柯庆施有名言道：“知识分子（按儒生或‘秀才’群体自然在内）的习性，有两个字可以概况。一是懒，平时懒于深刻检查自己，问题成堆就难挽救；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忘乎所以了。”（《徐铸成回忆录》，307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一懒二贱，古今一脉相通，真是说得透彻极了。陈布雷是蒋介石的“大秀才”，蒋的重要文告，皆出其手。为宣布抗日而发表的宣言，其中鼓舞民气的警句：“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号召全民抗战，至今七十年过去，而不为人忘。但最后不堪王朝覆灭之痛，不惜以死谏主，也是一个悲剧。陈布雷、陈伯达，前者以文笔胜，后者以理论显，二陈所遇人君不同，遭际亦不同，但同属一个群体，同为悲剧人物，则是一致的了。

陈伯达打倒后，中共党史学界赶紧为之“消毒”，可举两事为例。

一为“八大”决议案事。由于在这个陈伯达起草的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在大会表决时举手通过，但事后不满，大加批评，指背离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矛盾原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一条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见1973年8月24日“十大”政治报告）。因此把责任都推到了陈伯达身上。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写的一篇文章中，也说：“1956年，他（指陈伯达）在八大决议中塞进了一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后大受指责。”（《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123页）明白承认陈伯达是“八大”决议的起草者，“主要矛盾”如何如何是陈伯达的提法，而他是反对这个提法的，“事后大受指责”一语表明了他的态度。

但是等到气候一变，“八大”决议又复归“正确”，有一派的“秀才”们便要来争功了，首先便要抹掉陈伯达的著作权。“八大”这个决议究竟是谁写的，提“主要矛盾”又是谁的主意，便成了“悬案”。虽说“悬”，但绕来绕去，归到一点，就是“我回想可能是胡乔木”，“胡乔木就是把这样一个意思变成一段文字说出来”（杨胜群、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想》，108页）。其实都是猜测或故作模糊之词。还是看陈伯达自己说吧：“我倒了以后，上面派人来审问我时，问过我八大决议中关于生产力问题的那句话是怎么写出来的。……当时会议（指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全会）议程很紧，那天（9月27日）下午就要表决决议，我早晨还在考虑主要矛盾怎么写才好，我想起列宁有过一个想法，这个提法启发了我。我就把主要矛盾概括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向审问人员说明的这些情况，审问人员都是作了记录的。”（《最后口述回忆》，138页）这次事同时反映，“秀才”与“秀才”之间，也是时有矛盾，会时起内哄的。

另一例为196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通史》一书于1981年再版时，删去了对陈伯达所写《窃国大盗袁世凯》等三书评介的专门章节，并在书前的《重印说明》中写道：

这次重印……删去了第三章第七节。这一节最主要的内容是评介陈伯达的三本小册子《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的那一段。这三本小册子（主要是后两本）中有一些好的观点但并不是陈伯达个人的观点，而是我党当时对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情况的分析，只不过由陈伯达用个人名义发表罢了。对陈伯达其人需要严正的批判。但在批判时应该认真研究，看哪些是正确的（其中又有哪些是党的意见由他用个人的名义发表的）？哪些是错误的和反动的？只有经过这种认真的分析批判以后，才能对他在理论和学术上的作用做出恰当的评价。这样做，我们目前还办不到，因此只好删了它。

陈伯达看了这篇《重印说明》后，对陈晓农说了他的看法：

说我写的书不是个人的观点，是党的观点。这就令人奇怪了。党是一个组织，如果说有具体的个人先提出观点，党怎么能直接提出观点呢？还说我书中意见是党的意见，只不过用我个人的名义发表的。我写书，当然是写自己的观点，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尤其是中央几位领导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在解放前写的几本书，没有一本是党组织要求我写的，都是我自己自动写的，写出来以后，有的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有的没有征求其他同志的意见。只有解放后写的文章，才有些是党组织要求我写的。

陈晓农在陈伯达死后9年，在大陆禁绝陈伯达著作多年以后，看到台湾一桥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中国四大家族》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两书，书前写了导读，导读写道：

陈伯达的《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于1947年出版，揭露四大家族敛财的魔术，比一颗原子弹的威力还大。炸得风雨飘摇的蒋氏政权摇摇欲坠。宣传的力量比大炮还厉害。尽管他引用的资料必须有所考证。但作为宣传品，这是一本绝佳的小册子。我们可以从书中脉络看到四大家族如何违法敛财的一面；同时也警惕到，他们在贪污的同时，尤不忘用特务、暴力来羞辱人民的灵魂。

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把蒋介石的德行一一暴露，在1949年以前可算是一大著作。他历数了蒋介石的发迹，对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对异己的残暴，当然陈伯达也不忘反证中共的伟大。……这本书的正面价值是‘不用人身攻击，举证清楚’。台湾人写这类作品，除了道听途说之外，就是人身攻击。（以上所引皆见《最后口述回忆》，75—77页）

陈晓农认为，“出版者加写的导读对陈伯达的著作给予了客观的评价”。但陈伯达著作被禁出版，并不奇怪。我记得“文革”时期，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党籍”后，《毛选》第四卷中的一个附录《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便被删掉了。为什么删，没有说明；但大家心里明白，这是因为《决议》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起草者又是已被批判的追随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胡乔木。这个《毛选》新版本，大概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方再恢复过来。研究新中国版本学的，应该在新中国出版史上记上一笔。还可再举苏联的例子。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被解除一切职务，成为一名普通养老金领取者。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0年间，赫鲁晓夫的名字被一笔勾销，好像苏联历史上未曾有过这个人一样。相比之下，陈伯达的地位、名气差多了，他倒台后名字被一笔勾销，著作被一概禁掉，对一个小小的“秀才”即使是所谓“大秀才”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了。

在由中央专案组整理，中共中央于1971年底—1972年批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三批材料中，对陈伯达的批判，归结为“黑四论”，即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这个“黑四论”其实可合并为“黑一论”，即陈伯达起草的“八大”决议中的“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改革开放30年走过来的道路。除了“黑四论”之外，当然少不了还有毛泽东在1971年3月的一个批示上，早于中央专案组审查的结论出来前已为他定做的五顶帽子。正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的：“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身陷圜墙之中，谁可告诉者！”这里只要把“家贫”换作“罪重”，“货赂”换作“检讨”，完全就是陈伯达向朋友沉痛倾诉了。可悲的是，陈伯达此时此地竟找不出一个可听他作此倾诉的朋友！

◇ 二三事看陈伯达

一、陈伯达一生效忠毛泽东，老而不变，毛泽东还嫌他“脚踏两只船，本质不会改变”。其人落落寡合，习惯做“单干户”，不为人喜，尤不为“秀才”群体的气节之士所喜。但陈伯达有“理论”，他的“理论家”称号，并非“浪得虚名”，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能从人们不经意处抓住要点，抽绎综合，启人思考。多年前，传闻他一件小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位从延安出来的学者，写过一篇文章，记述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课，引用王国维以唐宋词词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衣带渐宽终不悔”、“众里寻他千百度”）来形容治学的艰苦历程，勉励青年要具备这样的坚韧精神，刻苦向学。自此治学三境界说大行于世。然而人们只知此说出自王国维，却不知若无陈伯达的提倡鼓吹，此说不会如此广为人知，直到今天还成为写文化散文学者的时髦话题，广受引用，虽然估计有的是稗贩来的，但陈伯达的鼓吹提倡之功却无人知了。

前不久我参加一位学者的追思座谈会，这位学者是公认大师级人物的。会上我发言提到，陈寅恪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常常引用了，但是如果没有今天纪念的这位大学者二三十年来的鼓吹提倡宣传，并且在自己的言行中坚持信守，那是不会如此深入人心的。我还举例为证，就在去年（也可能前年），他有一篇文章将在上海某大报发表，审读组要求把文内的“自由思想”一词删去，受到他的严词拒绝，宁可撤稿，不为屈服。最后只得尊重他的意见。在学术上首发警世之论的，固然是大学者，但接下来发现并鼓吹宣传实践者的功劳，也是不可没的，同样也是大学者方能做到。

叶永烈《陈伯达传》与陈晓农《最后口述回忆》记载，陈伯达“嗜书如命，乃万卷户”，个人藏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书籍各有三万多册，线装古书另放一室。他的大部分工资和稿费，都花在购书上。1958年起，他不再拿稿费，都捐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他倒台后，免不了抄家，全部书籍不知去向。后来仅发还二千多册。他从保外就医，到刑满释放，每月生活费100元，节省近三分之一出来，用于购书和订阅一些书刊。1983年2月，生活费增为每月200元，购书用钱稍觉宽松。叶永烈1988年访问他的时候，发现他不抽烟，不喝酒，像样子的衣服也没几件。与他同住的陈晓农说，他每天仍保持读书写作的习惯。

陈伯达1958年后不再领取稿费，全部捐献，当年他还在台上，也未见为之宣传，算不算一件大事呢？不说他未署名的作品，就说署名的著作，种数多，印数大，每年的稿费数字，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也买不起六、七万册书，还有较多的古籍和碑帖了（陈晓农说）。

大家都知道，《毛选》是支领稿费的，媒体公开报道，用这项稿费做了什么什么。近年有文章为之计算，历年累计已达巨数。这说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演说、报告等经过整理成文发表，并出版“选集”（还有文集、选读和不计其数的各篇单行本），大概都可以拿稿费。这同时就具有了著作权。出版法规定，本人去世，著作权保留50年，由后人继承。

可见中央领导人拿稿费是允许的，合法的。但是中央领导人1958年后放弃稿费，全部捐献归公，现在知道的，只有陈伯达一人。也许还有其他人，现在尚不知道。

陈伯达晚年写读书笔记，自1982年至1986年，叶永烈《陈伯达传》记有目录，共17篇。其中两篇分署笔名曾公开发表：《求知难》，署纪训，载《读书》1982年第10期；《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的顿渐两派》，署程殊，载辽宁《理论与实践》1983年第二期。此外《儒法两家“其实却是兄弟”》一篇，内部印发。

《陈伯达传》第一章全文收录了已发表过的《求知难——记读〈西游记〉》和未发表的《〈石

头记》里的一段公案——关于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姻缘问题》两篇文章，让读者领略到了陈伯达这位“理论家”的“治大国者若烹小鲜”的理论风采。他用阶级论和唯物辩证法观点，分析了《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关系与《红楼梦》里宝玉和黛玉、宝钗的婚姻问题，合乎情，顺乎理，既非生搬硬套，又无陈词滥调，言人所未言，使读者耳目一新。这种“举重若轻”的小文章，若让翻译过恩格斯《家族私有财产和国家起源》同时又教授社会人类学的潘光旦看到，一定也会称赞好文章。潘为恩格斯此书译本作注疏，每条常数百字至千字，就是同一类型小文章。记得毛泽东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曾用陈伯达首创的“四大家族”一词，指出贾薛王史即是《红楼梦》里的“四大家族”，好像提供了一把解读“红学”的钥匙，也曾令人耳目一新。他们二人之间，大有可能就《红楼梦》交流过看法，互有启发。

按陈伯达对陈晓农谈过，他在主持《毛选》的编辑与修订工作中，有两篇文章费力最多：一篇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篇是《矛盾论》，毛泽东当时看了这篇修改稿，曾给他写信，说：“想不到你修改得这样快，这样好。”（《最后口述回忆》，115—116页）说明陈伯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水平，不是没有受到过毛的赞赏。这两篇文章也正是毛自认为《毛选》中的重要之作。

四、1983年4月23日晚，陈伯达获准与已将出任文联主席的周扬见面，谈了四个小时。陈伯达曾将二人谈话内容，与陈晓农谈及，后者曾简要记下一些，载入《最后口述回忆》433—434页。现摘录有关文艺和读书问题方面的几条记录：

周扬：你现在写什么东西？

陈伯达：主要搞点经济问题的材料，也写了几篇与文艺有关系的文字，不知你看到没有？

周扬：我没有看到。

陈伯达：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艺有关的文章交给你看看。将来如果解放我的话，你看能不能让我在你领导的文联做点小事情，比如搞点材料，我可能还做得来。

周扬：这到时再说吧。

陈伯达：你现在看些什么书？

周扬：我有时看些文学历史方面的书。

陈伯达：你对俄国文学历史很熟悉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巴纳耶娃回忆录》，你看过没有？

周扬：巴纳耶娃是个什么人物？过去好像没有听说过。

（陈做了介绍，周让书记下了书名，说书是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译者是蒋路、凌芝。）

读者不觉得刚获平反复出的周扬，昔日的“官气”随着官位的恢复，不是又有点恢复了吗？而陈伯达依然是个“书呆子”。虽然周扬也是个“大秀才”，但读书之广而深，陈伯达显然超过了周扬这些人。

五、陈伯达曾经预见电子化时代的来临，并为此做了许多调查研究，在1965年期间，写了一个名为《工业问题》的建议书，提出重点抓电子技术，作为发展工业之路，呈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传》有一个章节，写陈提出“电子中心论”一事（258—260页），但只记载陈于此年3月5日及24日在中国科学院所作的两次讲话，不及《最后口述回忆》用12页的篇幅（234—246页）记述了这个“电子中心论”从提出到大批判的“命运”过程。

据陈伯达自述，毛泽东看了《工业问题》这个文件后很高兴，单独请他吃饭，说：“搞了这么多年，总算找到了一条发展工业的路子。”中央随后召开了一次常委会，讨论这个文件。一位中央领导人在会上说：“这个文件没有提以钢为纲的方针，搞电子等新技术，大家都没有经验，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搞太多新技术恐怕不合适，还是一切照旧，稳当一些好。”毛泽东听了没

有说话，其他人都没有发言，会议就散了。陈伯达对儿子陈晓农说：

这个文件被否定，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否则毛主席有可能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经济问题上。毛主席这个人总要找件事做，他的性格就是这样，耐不住寂寞，这件事没有做成，他就找另一件事做。如果他当时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问题上，就不会去搞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陈伯达晚年这个假设，又一次说明他对毛的性格与作风，没有真正的了解与认识。1971年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电子工业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的文章《“电子中心论”策略》，把陈伯达的“电子中心论”总结为两点：一、“电子中心论”是反对“以钢为纲”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反动方针；二、“电子中心论”是“技术中心论”的新变种。这篇大批判文章早代表毛泽东对陈伯达做出了回答。

据《陈伯达传》（24页）开列陈伯达晚年文稿目录，1983年陈伯达还在继续思考电子学革命问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这年三月写的《“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和秘密战》，另一篇是十二月写的《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电子学革命问题杂缀》。这时电子技术工业，已在改革开放的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了。陈以刑满释放之身，衰老垂暮之年，积习不改，国事难忘，当会乐观其成。

2008年6月9日，

端午节正式定为法定节假日后一日，于上海。

□ 原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多有删节。此为全文。

~~~~~

## 【人物春秋】

### 大将许光达的“文革”岁月

• 李意根 •

许光达，1908年生，湖南长沙人。先后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作为共和国开国大将，作为在共和国武装力量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建树、功勋卓著的一位革命家和军事家，那不容侵犯的神圣与庄严，却在十年“文革”的浩劫中被褻渎了……

#### ◇ 1966年，风云突变风暴起

1966年9月，率中国军事代表团去欧洲访问的许光达一行回到北京。机声隆隆，相伴着高音喇叭的叫喊声，“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声音格外刺耳，机场四处也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看到这些，许光达一行神情漠然，谁也没有吭声。

回到家中，许光达不像往日出访归来那样高兴，而是闷闷不乐的，一进门就坐在沙发上想着什么。当高声喇叭里“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吼叫声再次传来的时候，许光达拍桌而起，一股怒火冲了出来。他不停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怒气渐渐平息后，他又坐下来，向妻子邹靖华打听道：“最近还听到一些老同志的消息吗？”邹靖华说：“最近外面风传贺龙和彭真搞‘二月兵变’……”说完，邹靖华拿出几张红卫兵小报递给许光达。

许光达接过小报一看，上面有7月27日康生的讲话摘录：“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胡扯！”许光达十分气愤，把小报一扔，“什么‘二月兵变’，这事我清楚。”原来，1966年春北京军区从外地调了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主要是承担民兵训练、维护社会治安的任务。卫戍区曾为此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借房子给部队暂住，学校没同意。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变成“二月兵变”，还把彭真、贺龙硬扯进去呢？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时，许延滨、沈燕和曾正魁回来了。许延滨是许光达的独生子，此时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学生，同红卫兵串联，回到了北京；曾正魁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许延滨的未婚妻；沈燕是许光达的养女，正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刚才，他们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又发现了不少新闻，见许光达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向他讲述起红卫兵的“战果”来。

许光达皱着眉，打断他们的话题：“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会有两个司令部吗？你们天天喊‘造反有理’，造谁的反？你们年轻，见过的事少。凡事要多动脑子，多问几个为什么！”

听许光达一说，三个青年刚才的那股热情一下给问没了。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们再也没有去参加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了。

尽管许光达不让孩子们看大字报，但他自己却只能从大字报上了解社会动向。原来，许光达虽为中央委员，却很少看见中央文件，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

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向庄严的装甲兵机关大院，也开始受到红卫兵的冲击。大院内，机关办公楼到处贴满了大字报，不同派系的人不分黑夜白天，也不顾饥饿与疲劳，无休止地辩论着，争吵着。

11月28日，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派出代表来到装甲兵机关，找到许光达，提出要和装甲兵的造反派们一起，在院内开批判大会。红卫兵提出要批斗装甲兵黄政委（黄是刚从工程兵调来的），他们说黄政委在工程兵学院工作期间，生活作风不检点，有不少三反言行，过去没有人敢惹，现在机会来了，也该清算他的问题，还坚持要在批判大会上给他戴高帽子、挂牌子。

许光达说：“会可以开，有意见可以提嘛，注意大的问题，至于生活作风，我们党委会可以开会处理。”

经过协商，许光达和红卫兵们达成如下协议：当晚在装甲兵礼堂开大会，由工程兵学院的红卫兵发言，许光达和装甲兵领导同志都到会参加。

晚上，批判大会开始后，红卫兵代表刚发完言，突然从主席台的两侧走出几名红卫兵，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受批判的黄政委戴上。许光达见情况有变，当即起身制止。红卫兵们用力推开许光达，并高声斥责。

“你们不守信用，你们还是军人呢，这么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子，那就先给我戴上好了！”许光达边说，边上前去抢高帽子。激动的情绪，无法抑制的愤怒，使许光达心脏病突然发作，倒了下去。

全场哗然。台上的人忙着抢救许光达，台下的人闹闹嚷嚷。许光达被送了解放军总医院。经过医务人员的紧张抢救，许光达才慢慢恢复了知觉。

造反派们并没有就此放过许光达，他们带来一副对联，要贴在许光达病房的门上，遭到护士的拒绝后，他们就把对联贴在许光达家的大门上。上联：小将造反有理；下联：老将理应支持；横批：造反有理。

#### ◇ 1967年，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1967年新年过后，形势进一步恶化。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相继夺权，好多地区处于瘫痪状态。住在医院里的许光达，虽然病情有所好转，但心情越发沉重。

1月16日，许光达回装甲兵司令部主持了一个重要会议。晚饭过后，正准备回医院。这时，突然跑来一些机关干部和军校的“红卫兵”。一个小青年喊道：“许光达，走，到办公室回答问题去。”说完，一伙人拉着许光达就往办公室走去。

许光达跟着一群人刚走，又来了一伙，闯进家里，为首的竟是许光达的生活秘书陈志文。一进门，陈志文就直奔许光达书房，打开保险柜，哗啦哗啦地把里面的东西全翻了出来。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又乱翻许光达的写字台、书柜，还是一无所获。后来，他又冲进其他房间，仍然没有搜出什么，就把邹靖华卧室里的一石膏仕女像给砸碎了，说是砸“四旧”。

之后，陈志文直接找到邹靖华：“把‘二月兵变’的黑名单交出来！”邹靖华这才明白他们要找什么。原来，16日下午，李作鹏在海军机关对军队院校来京的“红卫兵”代表及各总部群众代表说：“贺龙要搞‘二月兵变’，许光达是总参谋长……”这些人听见风声，便行动起来了。这简直是莫须有的罪名！

“你是秘书，你都知道，还用问别人？！”邹靖华顶了回去。

陈志文没办法，命令其他人继续寻找。家里被翻得乱七八糟，根本没有什么名单，却抄出了一面日本旗，“红卫兵”们如获至宝，说这是许光达叛国投敌的罪证。许光达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二十多年前与日寇浴血奋战，亲自从日军手中缴获的战利品，今天竟然成了投敌叛国的罪证……

被带到装甲兵俱乐部后，许光达发现已经有好多人坐在那里，有装甲兵所属院校的“红卫兵”代表，有三总部的群众代表，装甲机关院里的人也来了不少。俱乐部的气氛相当严肃，谁也不敢高声说话。

一排“红卫兵”坐在主席台上，他们手里都拿着红宝书。一个“红卫兵”冲着他大声说道：“许光达，你知道我们要你回答的问题吗？主要有三个：一、你要交代‘二月兵变’的阴谋、篡夺总参谋长职权的罪行；二、你鼓吹‘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是反对突出政治，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观点；三、听说你有三个老婆，除了北京的一个，老家还有两个，这是犯重婚罪。”

许光达平静地扫视了全场，说：“好吧，我现在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你们说的‘二月兵变’，我不清楚。谁都知道，如果搞‘兵变’，那是要掉脑袋的，我跟贺龙搞‘兵变’，我把脑袋挂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当，而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这个买卖太不划算，亏本的买卖我不干。”许光达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了一个形象的比较，回击了他们的提问。会场上有人笑了，也有人觉得不满，大声地说着什么。会场吵吵闹闹，主持会议的人无法使许光达就范，

反而让许光达问得张口结舌，只好命令休会。

就这样，身为中央委员的许光达不明不白地被关押起来了。许光达被关押后，开始静下心来考虑自己的问题。他想，自己戎马生涯四十年，难道一点错误没有？被关押之前，整日忙忙碌碌，我许光达又不是神仙，工作中肯定会有失误的，过去没有时间坐下来反省，现在好了，没有干扰了，可以安下心来反省了。许光达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一番清理，查找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3月31日，在被关押两个多月后，许光达又不明不白地被释放了。回到家，许光达继续沉浸在对自己历史的清理之中。他让邹靖华、许延滨、曾正魁和沈燕帮忙整理被抄家后剩下的他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过的文章以及过去的一些讲话稿和日记，对照党的方针政策，对照毛泽东的指示，查找错误。他说：“你们都参加过红卫兵，都写过批判稿，现在就要求你们用红卫兵的挑剔眼光，从我的这些材料中找出缺点错误，要‘鸡蛋里挑骨头’，找出哪些是不符合毛主席路线的，我要做触及灵魂的检查。”

邹靖华、许延滨等人按许光达的要求，用大白纸画成表格，一边是许光达讲的，另一边是毛泽东讲的，中间是批注，指出许光达错在哪里。许光达花了很长时间，一共写了十几万字的检查材料。许光达打算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会议上，把这份检查公布出来，认真解剖自己，让自己的“灵魂”亮亮相。他想，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还有什么需要隐瞒的呢？

8月14日，造反派又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冲进许光达的家，不由分说地撕去他的领章帽徽，把他给逮捕了。

邹靖华大声斥责道：“你们要干什么？他是中央委员、大将，要逮捕他必须有中央和军委的命令，至少要有军事检察院的逮捕证，你们随便抓人，是非法的。”

许光达十分清醒，他平静地对妻子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十年那样的生活。”他转过身对刚刚结婚的儿子和儿媳说：“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爸爸的一生交给了党，你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

许光达被带到装甲兵招待所。这次关押和上次不一样了。这次已被撕去领章、帽徽，名副其实地成了阶下囚。而批斗也主要是武斗，两个大汉对这个年逾花甲的老人拳打脚踢，打得他浑身是伤，几次休克……

许光达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他头上顶着两项帽子：一项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一项是“三反”分子。此刻，他最担心的是妻子邹靖华，她能承受得起这种打击吗？

#### ◇ 1968年，寒风中的温暖

在那个非人的年代，给铁窗中的许光达无限慰藉的惟有家人在寒风中给他带来的暖暖亲情。

1968年2月25日，许延滨的妻子曾正魁生下了一个女孩，婴儿的诞生，给这个冷落的家庭带来了一些生气，增添了一份新的希望。许延滨夫妇很想把这一消息告诉许光达，可实际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最后，只好拍了一张照片，让炊事员张进保利用送饭的机会带给许光达。望着孙女的照片，许光达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突然，一只手猛地伸了进来，抢去照片，扔在脚下：“狗崽子的照片，长大了也不是好东西，

也是个反党分子!”

“你给我捡起来!”许光达怒吼着,严厉地瞪着看守。看守是第一次看见这位开国大将发怒,大将的威仪震慑了他,一种无形的威力迫使他乖乖地捡起照片。不过,张进保却从此不能再送饭了,家人与许光达的联系被割断了。

2月底的一天晚上十点多,一群造反派闯进了许光达的家,逼迫邹靖华在晚12点前搬到院里的一间破房子,同时规定只准带简单的炊具和行李,其他东西一律查封。造反派还让邹靖华交出银行存折,告诉她工资一律冻结,每月只发生活费。在邹靖华带走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婴儿小床。原来,许光达被捕后,家人已料到将被扫地出门。他们在帮助许光达整理检查时,发现将军保留的大量资料十分宝贵。于是,他们把这些资料用塑料布包好,平放到小孩床底部的夹层里,上面铺着小孩尿布之类的东西。造反派们当然不愿闻尿味,都躲着这张小孩床,催促许延滨自己把床搬走。

许光达与妻子见最后一面是在1968年的初春。当时,许光达等“黑帮分子”被拉出来打扫装甲兵大院。得到消息后,邹靖华领着一家人早早站在路旁的一棵白杨树下,远远地向许光达望去。曾正魁把女儿高高举起,挥动女儿的小手向爷爷致意。许光达看见了家人,眼里闪着欣喜的亮光,也不断地向家人挥手致意。

连续不断的批斗,使许光达的健康状况日趋恶化,咳嗽吐血,心脏病经常发作。可是,专案组不给他治疗,逼着他交待罪行。他们在材料上写道:“许光达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每当斗争的关键时刻,他就装病。”他们公开宣扬,“许光达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贺案中的2号人物”,对许光达要“继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要敢于“刺刀见红”,“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礼”,叫嚷着“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战斗任务”。

有一次,专案组对许光达连续批斗了53个小时,专案组的人轮流值班,却不许光达吃饭,试想一个身患心脏病的老人哪里经得起这样的折磨。许光达心脏病发作了,虽被送到医院,但专案组仍不放松。有这样一份材料,真实地纪录着许光达经受的这段非人的折磨:

“在一年多的批斗、审讯中,经常罚站、弯腰、请罪,多次搞“车轮战”,其中一次长达三天三夜。还多次把许光达同志搞到外单位去游斗。许光达同志被整得昏厥过去,经医生抢救后继续审讯。”

“1968年11月中旬,许光达同志夜间咳嗽,出现痰中带血、吐血等症状。专案组人员频繁审讯和逼写材料。”

“11月中旬到住院,两个月中,共审讯七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五次。”

“专案组不顾许光达病重,把病房变审房,加紧审讯和逼写材料。据记载,在第一次住院的七十八天里,被审讯二十九次,逼写材料二十九次。出院后二十一天,审讯八次,写材料七次。”

“第二次住院,已是生命垂危,仍有审讯活动,直到逝世前三天,还被迫请罪。”

◇ 1969年,将星陨落

1969年5月16日,“许光达专案组”正副组长徐浩、姜永兴通知许延滨夫妇去做许光



达的工作。他们对许延滨夫妇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和他谈话，他都骂人，你们去做工作，让他赶紧认罪。”

5月26日中午，许延滨、曾正魁带着他们一岁的女儿曾雪青去了医院。在许光达的病房里，已经坐着专案组的三个人，门外还坐着一个人作记录。

雪青是第一次见爷爷，“爷爷！爷爷！”喊个不停。经历两年非人生活的许光达，一直处在十分冷漠之中，听着孙女的呼喊，心里一热，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许光达同儿子儿媳见面，一直在监视下进行，儿子想知道爸爸心里想说什么。他掏出一个听诊器，放在许光达的喉头处：“爸爸，我给你听听病。”

许光达看着这个听诊器，马上联想到坦克上的喉头送话器，他明白儿子的用意，小声说：“请设法转告周总理，我有话要和他谈。”

回到家里，许延滨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请总理派人来同许光达谈一次话。为了使这封信尽快到达周恩来的手里，许延滨按照组织原则，正大光明地要求专案组、装甲兵党委把这封信转呈周总理。6月2日，专案组的人员正式通知许延滨信已转走。

6月3日，专案组把许延滨叫到办公室，说许光达病重，让许延滨去看，但他们又不放许光达走。10点钟左右，专案组派人来通知说许光达去世了。

6月26日，《解放军报》在报眼上刊登了许光达病逝的消息。

6月30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许光达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就这样，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共和国开国大将许光达，没有死在枪炮轰鸣的战场，却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明不白地走了。

整理许光达遗物时，人们发现一本一直放在许光达怀里的浸透了汗渍的党章，里面夹着早逝的女儿玲玲和孙女雪青的照片。而他的另一份遗物，是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是他亲手写的一首诗：

身经百战驱虎豹，  
万苦艰辛胆未寒。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后来，诗人赵朴初读了此诗，极为动情，欣然命笔，作《读许光达同志遗诗感赋》，表达了自己对许光达的崇敬之情，高度评价了他光辉的一生：

刑威不能屈，烈火出纯钢。  
节节皆忠骨，寸寸是刚肠。  
句句腾正气，字字发奇香。  
宜做军民范，永为邦国光。

1977年6月21日下午，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经中央军委批准，许光达骨灰安放仪

式在此举行。粟裕大将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追述了许光达的生平，评述了他的丰功伟绩：

许光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的领导和导师毛主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光明正大、团结同志、谦虚谨慎、作风民主、艰苦奋斗、积极工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我军和装甲兵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许光达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

□ 《党史文苑》 2008年第9期

~~~~~

【学术动态】

重写周恩来，撼倒“不倒翁”

• 寒 山 •

如果要问任何经历过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谁是政治上的不倒翁，答案恐怕千篇一律会是“周恩来”。在一个政治原则和道德品格荡然无存的时代，“不倒翁”这个绰号当然会使人得出机会主义者的结论。文化大革命也确实是一个只有机会主义者和见风使舵的人才能幸存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诗人北岛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写下的“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是对那个时代在道德上的最有力的判决。

但是，任何语言都有歧义，中文尤其如此。当很多中国人说某人是“不倒翁”时，常常也包含一种钦佩或者赞赏，有以成败论英雄的意思。因为这个人在那样危险复杂的环境下靠手腕和花招幸存下来了，所以他很了不起，至于他的幸存让别人付出的代价就不值一提了，因为大家都想方设法要生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不倒翁”也有褒义，夸的是胜利者或者甚至是英雄。

对于在文革中吃尽苦头的中国人来说，“不倒翁”可能还有另一层褒义，这就是：幸亏有周恩来这个不倒翁，否则我们的日子不知还要艰难多少倍呢。这就是说，和周恩来维持国计民生，常常不得不为毛泽东收拾烂摊子的努力相比，他为了个人生存所付出的道德代价太微不足道了。

在中国政治历史上，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不倒翁。中国大陆出版的周恩来传记作品中，他在文革中的幸存被说成是为了党国忍辱负重，反而体现了他的崇高品德。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海外历史学界和普通人，“文革时有周恩来总比没有要好”是一个普遍的看法。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由余英时和巴巴拉·史德兰合写的周恩来政治传记，试图对这个不倒翁现象作一些分析。在有关文革的章节中，作者强调了周恩来在制造毛泽东个人崇拜中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文革前直接导演了一些大型歌舞，篡改中共历史，神化毛泽东，为文革制造气氛。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两面性，对所谓周恩来保护了一大批干部的官方说法釜底抽薪。

作者指出，周恩来身为中央专案组组长，是一系列大案要案的直接负责者和操作者。他对刘少奇夫妇，贺龙和陶铸等被迫害者的态度完全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当毛的态度不明时，他可以对他们给与充分照顾，给人以所谓老战友的温情。而毛一旦下决心把他们往死里整，周立刻翻脸，决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对他们手下留情的把柄。周恩来一向有对下属关怀体谅的名声，然而一旦他的那些省部级下属对文革的态度会给他带来麻烦时，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抛出来以保护自己。煤炭部长张霖之和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等人的遭遇就是如此。至于林彪事件之后

周恩来确实利用形势对党内受迫害的高干作了保护和重新起用，书的作者指出，这也是他巩固自己不倒翁地位的举措。

有这样一个不倒翁在中南海里摇来晃去，毛泽东才能肆无忌惮地把中国投入史无前例的文革灾难之中并持续了十年之久。

~~~~~

## 【书 评】

### 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研究，宜细不宜粗 ——评舒云《林彪画传》

• 仲 岩 •

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宜粗不宜细。……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92页，294页）这句话只有一半的道理。对待一般的历史过程、历史现象，是适用“宜粗不宜细”的，因为历史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无比庞杂的过程，事事都要细写，将陷入烦琐哲学，写不胜写。但是，对重要的历史事件，尤其是对一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作为历史学家，就“宜细不宜粗”了，就应当仔细地记录并分析研究该事件发生的原因、具体过程、最终结局以及与该事件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的作用，从中得出必要的历史结论和历史教训，给后代的人们以启发和借鉴。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人类认识自身既往行为的科学的意义。所以，“宜粗”还是“宜细”，要因事因人而异，不宜作泛泛之论。

林彪以及林彪事件，对于中共的历史和中国当代史来说，无疑是一个应当细写的人物和事件。舒云女士的《林彪画传》，内容丰赡、图文并茂，在细写林彪和林彪事件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该书对林彪的成长历程、百战生涯、军政才华、卓越建树等等，记述得细致入微，远胜他书，而且文笔生动，使林彪的形象跃然纸上，使读者对林彪在中国近当代纷扰复杂的军事政治舞台上脱颖而出的历史必然性，有更清晰的了解。对林彪的战略战术、军事思想和主要战例，作者也从军事学的角度一一细述并做了精当的评价，对于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由亲密到破裂的关系，以及林彪晚年的起伏和悲惨结局，该书更是博采资料，细加述评，并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有所突破。

作者突破前人之点，显著体现在罗瑞卿问题上。官方的一贯说法是，罗瑞卿是遭林彪陷害而倒台的。舒云则通过对此事知情者的多方调查，基本搞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罗瑞卿的倒台实为多种因素所造成，首先是毛泽东的怀疑和不满，其次是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对罗的强烈意见，再次是林罗之间工作上的矛盾和误会。其中，罗瑞卿本人的孤傲和张扬，也给自己造成了不利的因素。林对罗确曾有过意见，但有意见与要打倒是两回事。查核此事的发展脉络，林对罗的倒台事先未能预料。所谓叶群揭发的刘亚楼临终转述的那四条，即使真的存在，也不过属于一般性问题，不足以导致罗瑞卿倒台。再如贺龙一案，也是毛泽东的怀疑在先，毛对苏联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曾劝贺龙谋反一事，心中不安，多次提到贺龙随身带枪，其次才是林彪、周恩来附和毛（周也有过批贺龙的讲话，此事作者未引）。林彪与陶铸的倒台更是毫无关联，对刘少奇的倒台，也是在形成既成事实后才被动表态。画传以精练的笔触写出了这些事情的原委，给读者以新的认识。另外，作者对所谓林彪吸毒的说法，对所谓林彪不读书不看报的说法，也都以确凿的事实予以了驳斥。

综观中共的党内斗争，有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就是往往把一些本来人们之间常见的意见分

歧、普通的关系不和，小题大做，上纲上线，搞成敌我矛盾，非要把一方打倒方罢休，如罗瑞卿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毛泽东自己说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却不能以正常的心态处理之，这固然表明他的思维存在缺陷，更表明中共的党内缺乏梳理、调和、化解矛盾的机制。一个人一旦成为高级干部，就只能升不能降，当他被认为犯有错误或不称职时，不是依靠正常的工作调动或职务升降来解决，而是非要把他打倒而后快。这个现象在后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缓解，但还不好说有了根本的解决。根本的解决还是要依靠高度的民主和监督制度。

舒云女士的《林彪画传》一扫过去官方对林彪的妖魔化宣传，还原了林彪生活简朴、勤于学习、身先士卒、善待部下、多谋善断、屡建奇功，为中共军队的壮大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军事统帅形象。作者对林彪深抱同情和敬意，同时对于林彪与毛泽东关系的恩怨变化，林彪对毛泽东极尽歌功颂德的讲话，也以客观的态度做了如实的叙述。对于林彪吹捧毛泽东的现象，作者认为主要是出于毛泽东的意思，但我以为这与林彪当时的思想认识也是分不开的。林彪与毛泽东长期合作，对毛的长处和短处均知之甚深。他一方面对毛的短处十分警惕和反感，一方面也真实地服从毛、推崇毛。可以说林彪对毛泽东怀有双重认识、双重情感，犹如韩信对刘邦怀有双重认识、双重情感。林彪在公开场合宣传崇拜毛泽东，私下却又写下批判毛的只言片语，基本上是源于他的真实而矛盾的思想认识，只不过有可以公开与不可以公开的差别罢了。林彪前半生对毛泽东的拥护应该说是真心的，他并不是“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人。现有的资料表明，在1970年庐山会议之前，林彪从未有过反对毛泽东的举动或反对毛泽东的计谋。1971年华北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明批陈伯达，暗批林彪，不断要求黄、吴、叶、李、邱等人做检查，使林深感矛头指向了自己，并已步步进逼，无法回转，在此形势下，林彪之子林立果等铤而走险，制定了“五七一工程纪要”。对这个“纪要”，并无林彪知情的证据。如果林彪是一个爱说假话的人，他完全可以假装积极批陈，违心做点检讨，以掩盖自己。不是有人就凭主动检讨并声明永不翻案，而重新取得毛的信任和重用吗？以林的谋略，他也可以如此这般，但他却不肯，可见他并非善说假话之人，要让他喜怒不形于色地以假面孔待人，是很难的。

至于画传的不足之处，在于某些论述仍嫌粗略。如第618页关于军委八条的产生，没有日期，细节也不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记载：“一月二十四日徐向前去找林彪，……二十五日他又写信给林彪……。当天，林彪同徐向前、陈伯达、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共同商议后，拟出七条规定，当天送给毛泽东。”毛增加一条成为八条。此记载系依据林彪1967年1月25日给毛泽东的信（见《毛泽东传1949—1976》1475页注3），重要性超过其他材料。《画传》第682页说：“他（指林彪）自己的公开讲话，都是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此说也不确当。如林彪1966年5月18日的讲话，为梁川和戚本禹依据记录稿整理（见《百年林彪》26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有毛泽东对林彪几篇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其中1966年8月31日的讲话稿有林彪的修改，9月15日的讲话稿为陶铸送审，即是由陶铸起草的。张云生《毛家湾纪实》中讲述了林彪办公室秘书曾为林彪在1966年10月、1967年3月、1968年10月等几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拉条子”，以及林彪对“条子”有所取舍的情况。所以，对林彪的讲话也应细作分析，不宜一概而论。此外，画传对导致毛林关系破裂的1970年庐山会议的记述也过于简略，未能言及汪东兴在会上起的导向作用，可能因作者在其所著《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中已有这方面的论述，就在本书中省略了。

同其他现代史方面的书一样，书中存在一些缺点是难免的，主要的原因是有关的档案没有解密，作者只好较多地利用回忆资料，而由于回忆者身份、视角的不同和记忆力的差别，这些资料难免存在一些模糊、差误或相互矛盾之处，尽管如此，作者汇集这类资料仍很有益，有利于史家做更深入的研究。总之，瑕不掩瑜，舒云女士的这本画传堪称一部有独到见解的极富特色的书，值得关注这段历史的人们认真一读。

□ 原载《多维月刊》2008年8月号

~~~~~  
【自由论坛】

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 陈永苗 •

不管是社会主义理想，还是改革理想，在特权官僚的领导下，都被虚无，推到遥遥无期的彼岸，此岸留给人民的，是专制和腐败，这二者是一个整体，文革专制多腐败限于高层，改革专制略少腐败全面蔓延，是一个总数不变或者上升的过程。单纯结果来看，文革强化了极权的黑暗，而改革同样延续，颈上的轭换成“高科技”的。

从意图来看，文革与改革，都有一个象征彼岸自由与富裕的人物，在人民心中若有若无的毛泽东与虚拟的邓小平，来对党和官僚进行打击和遏制。可是他们同时是专制官僚的总后台，总司令。就像封建时代的皇帝，与官僚阶层又合作，又斗争，可以打击豪强，同时是豪强的总后台。

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文革浪漫派回到毛泽东的象征意义，社会主义理想，与改革原教旨主义，回到邓小平的改革理想，同样是失败的。从封建皇帝，到邓小平，从来没有成功。

皇帝，毛泽东或邓小平，可能站在人民一边，更可能站在官僚阶层一边，在双方对这种符号资源的争夺中，官僚阶层有压倒性优势。也就是一旦人民打起这个牌，获得更大利益的官僚阶层，而不是人民。按照官僚阶层的牌理出牌，肯定玩不过他，只会输得很惨。例如毛泽东好像非常站在人民一边，可是当诉诸于毛泽东这个符号，更有利于官僚阶层，只有形左才足以霸占权力，可以实右，把权力转化为金钱。即使诉诸于毛泽东再次爆发了革命，那么也会想上一次那样，由新毛马上图穷匕见，转化为新邓。有毛必有邓，有邓必有毛。

我一直想对文革浪漫派说的是，用毛泽东这个牌子打邓小平，同样为邓小平所利用。实质意义上，毛泽东与邓小平，是一个镜子的两个面。我一直想对改革原教旨主义说的是，邓小平这个牌子打毛泽东，同样为毛泽东所利用。

毛泽东有足够的弹性来容纳邓小平，邓小平同样是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的表达。即使可以用毛泽东重来一次，那么将来也必须会重现邓小平，出现腐败。毛泽东在战争中出来来的绝大权威，谁都没有改变，连他自己。再来一个毛泽东，又何用？在很难再出现一个新毛泽东的中国，鼓吹一个毛泽东式政治，根本就缺乏首要条件：世间再无毛泽东。毛泽东的意图，在文革浪漫派看来，可以是美好的，但是连毛泽东都没有实现，那么谁还敢重来一次呢？

如此说来，我必须揭露文革浪漫派心中的狂妄和僭越，他们心中隐隐约约自诩，自己是毛泽东。这种狂妄和僭越，根本没受到压制，即使让文革浪漫派上台，他们只会吓搞，连毛泽东的后更脚跟的碰不到。

当我表达了这个观点，我就可以对邓小平不置一词，因为改革还是邓小平小手在毛泽东的大手中搞，邓小平躲在毛泽东的影子里面，并且把毛泽东处理为影子，这样展开改革的。从文革到改革，二者是政治逻辑是一致的。邓小平并没有骗我们，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可是我们不听他的真话，自己欺骗自己，不顾残酷的现实。

不管是毛泽东时代的专制，还是邓小平时代的权威主义，有一个根本前提，是不容置疑的，而且是无所不在强化。那就是思考一切出路，必须在一个原则之上思考，而这个原则是不容任何质疑的。错误总是别人造成的，自己总是正确的，即使一段时间错误，改正了又是正确的。而是觉得道义就在他身上。拒绝法律，也拒绝高于他们的东西，觉得天理道义就是他们，就在他们身上。这一点被当作绝对律令：是所有人政治思考的前提。总而言之，从来不会考虑到，自己就是万恶之首，是一切灾难的源头。

革命一成功，他们自己就成为口头上的理想主义者，实际上的独裁者。人是自私的，每一个人都喜欢享受别人的自我克制，另一方面为自己缺乏自我克制而得意。贝卡利亚写道，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束缚他人的契约没有束缚自己，每一个人乐意成为全部世界的中心。

在毛泽东那里，我很佩服的一点，是他一个人和自己所缔造的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对立。对此，我心存感激。中国从古到今，从来没有如此对皇帝、主权政党和官僚从来没有如此，把他们当作潜在和实在的敌人。这种不顾一切做实验，实现理想的精神，把毛泽东强化到一种化身和象征意义，因此成为民众的神话。这一种是世俗福音，因此我可以同情地理解，民间对毛泽东的崇拜，及其化身和象征意义。几千年以来，底层的最强烈的感受，从来没有这样过的。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毛泽东一样，让民“心中像火一样燃烧”。而这种最深层震撼，可以与只有基督福音传进来，造成大理的破裂。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敌基督者。

当然我并不因为如此，就把毛泽东从这种统治者通知与被统治者的古老矛盾中拯救出来，从罪恶中捞出来洗干净。毛泽东还是沉沦在这种罪里面，但是他试图反抗。就像尼采还是沉沦在西方新而上学的伟大传统中，但是他试图反抗。这种反抗，令我感激，他的失败，令我扼腕，他的残暴，让我痛恨。

为什么要坚持“形左”。就是为了掠夺，没有专政的主权，到那里掠夺？官僚权贵不仅要掠夺财产，还要掠夺人民的名义。例如石油涨价，要说了人民。官僚权贵不会放弃专政的主权。而且要有各种美好的理由掩盖，强化专政的主权。所以不要青红皂白述说美好的理由，例如改革理想，先要看看，这种美好的理由，到底是为了真正的美好，还是为了邪恶。

1949是一场克拉玛依大火，而改革是在找出口。可是出口已经被领导改革的专制者，腐烂臃肿的身躯堵住。而改革这个意识形态，只是越加恶化这种情形。官僚权贵就是癌症，乃国弱民穷之源也，大国举起的绊脚石。一切的出路，都被挡住。救中国，必须亡专制。

卢森堡对列宁质问过，如何防止革命政党腐败，这种质问不绝如缕。这样的质问有两种指向，一种是为了完善，另外一种是根本性质疑和摧毁。如果堕落是必然的，这种失败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挽救的，还有就是原来的路本来就可以改革，不必要这样走极端，那就可以否定掉社会主义极权革命的正当性，当然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的正当性。必须从1949猪圈的诅咒中走出来，必须删除1949，恢复1911。这么说来，当经历无苦难和无数代价之后，完善之路根本就是错误的，改良并不是对1949年的改良，而是对1911的恢复。终结军政训政，恢复宪政。所以文革浪漫主义的左倾完善肯定是错的。必须有根本的质疑，而且必须排除意识形态对质疑的干扰。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y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